

法國與變局後的歐洲

蘇秀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召集人)

一九九〇年的歐洲局勢快速演變，法國面對雅爾達密約下的歐洲格局已經消失，東、西方冷戰結束後的新歐洲，雖不再有蘇聯集團的存在，但却出現一個統一的德國。

幾個世紀以來，法、德兩國經過多次戰爭，歷史上有解不開的恩怨情結。直到一九五〇年，法國外長舒曼宣佈「舒曼計畫」把引起戰爭的重要物資煤和鋼置於歐洲化煤鋼聯營體制之下，才將法、德關係推向一個歐洲新遠景的和平模式。

歷史上每次歐洲秩序的改變都曾經過一場戰爭，但是一九九〇年的空前變局却没有流血，而是共產主義統治地區政、經制度全盤失敗導致的結果。

法國外交政策傳統上標榜獨立自主，戰後四十多年對戰敗的德國一直處於優勢發言地位。目前面對主權恢復完成統一後的強大德國，雖在事前已安排多項防範措施，但仍不無疑懼；對蘇維埃制度解體後而仍握有巨量核武和高居歐洲首位傳統軍力的蘇聯動向，更表關注；對美國主張大西洋聯盟繼續保留北約組織的立場，雖表贊同，但希望北約組織僅限於有防衛歐洲的可能性，美國不應藉北約組織干預歐洲事務。

目前法國外交目標在加速促進歐洲共同體的政治整合。密特朗為貫徹法國人心目中的歐洲主義，構想以歐市十二國為中心成立歐洲邦聯，再逐漸擴及東歐及其他國家，但，這條路並不是平坦的。法國面對新的歐洲，正面臨兩難的處境，究將何去何從，終須作一選擇。

法、德關係的歷史情結

東、西方冷戰已經結束，法國在後冷戰時期所面對的新歐洲，不再有蘇聯集團，但有一個統一的德國。

從法王路易十四時代到滑鐵盧戰役這一段期間，法國是當時西歐最強大、最富庶和人口最多的國家，曾一再試圖成爲歐洲的霸主。依據一六四八年威斯特法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①法國心滿意足地把德國分割成數以百計的「迷你」小邦，而且沒有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機構。拿破崙權力鼎盛時代，對普魯士實施欺壓政策，激發了日爾曼民族主義的興起。一八一五年英、俄、奧、普於拿破崙戰敗後，舉行重新調整歐洲均勢的維也納會議，法國和與會各國取得共識，維持當時德國各邦分立的現狀。

在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七〇年間，法國在經濟上和人口上已失去了比較有利的優勢，而拿破崙第三在政治上的無能，使普魯士輕易地控制了北部德國各邦，爲德意志帝國統一開創了契機。一九七〇年的普法之戰，法國雖明顯地缺乏準備，但仍然爲阻止德國統一做最後一次的努力。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在凡爾賽宮宣佈成立，法國從此國勢趨於衰弱，已不再是西歐最重要的陸權國家。^②

從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〇年的二十年間，由於和德國在經濟上及人口上差距的加大，以及在政治上的孤立，使法國的處境日益困難。一八九〇年之後，法國極力尋求與國結盟，特別是以英國爲對象。這時法國所追求的祇是安全而不再是成爲霸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一九年協約國處理德國戰敗問題及成立國際聯盟的凡爾賽和會，法國挾戰勝國餘威，一心一意要在處理戰後問題上，使德國永難翻身。支解德國的構想雖因盟國反對未能達到目的，但德國被凡爾賽條約緊緊地束縛，解除了軍備，又加上天文數字的賠款，^③但却大大地刺激了德國極右派分子包括希特勒在內的憤怒，這些極右派分子所要做的強國復仇工作，也正是法國所懼怕的。一九二四年以後，法國曾採行比較寬大的和解政策，但並未得到回應。

一九四五年五月，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早在三個月之前，美、英、蘇三國已在雅爾達締訂密約，重劃戰後德國疆界，美、蘇並在歐洲劃分勢力範圍，法國並未被邀請入會，但以戰勝國之尊，在戰後四十多年中，對德國一直處於優勢地位。

到了一九五〇年，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human 1886~1963）宣佈「舒曼計畫」（Shuman Plan）爲歐洲開放一個新遠景的模式，將德、法經濟的敵對和法國欲分享德國資源的要求納入在歐洲煤鋼共同體的體制之下，經由歐洲化煤鋼聯營的方式加以解決，稍後再擴大爲今天十二國的歐洲共同市場，^④四十年來，法國一直在這些機構內扮演著主導的角色。

註① "In 1648",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cdonald, London, 1982), p. 58.

註② C. J. Bartlett, "The Last Years of the European Balance between 1815~1961 and 1871~1914," *The Global Conflict 1880~1970*, (Lorgman, Singapore Publisher, Pte Ltd., 1984), pp. 4~33.

註③ Robert O. Paxton, "The Paris Settlement," *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 (Columbia Univ., 1985), pp. 169~181.

註④ 請參閱蘇秀法，「羅馬條約三十年」，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九期，民國七十六年六月，第三~四頁。

在近代史上，一八一五年英、俄、奧、普於拿破崙戰敗後重新調整歐洲均勢的維也納會議，一八七一年普魯士擊敗法國後的德國統一，一九一九年協約國處理德國問題及成立國際聯盟的凡爾賽和會，以及一九四五年重定德國疆界，美、蘇劃分歐洲勢力範圍的雅爾達密約，都和法、德關係有著歷史的情結。

「雅爾達秩序」的消失

雅爾達密約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是德國割裂，歐洲分治，東、西方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美、蘇主宰歐洲事務而形成不同意識形態之尖銳對立的局面。

回顧歷史，每次改變歐洲秩序的大事都是經由戰爭，但是，到了一九九〇年，打破雅爾達密約規範下歐洲局面的却不是戰爭，^⑤而是易北河以東地區政治和經濟僵化制度的解體和自由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結果。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美、英、蘇三國並未邀請法國參加。被摒除於會議之外的法國深恐在這三國秘密會議特別是美、蘇劃分歐洲為各自勢力範圍下，也像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一樣成為犧牲者。

當美、蘇兩大超強進行冷戰期間，法國除了對雅爾達會議時美、蘇的「共謀」心懷不安之外，又增加了一種恐懼，恐懼有毀滅性的世界性衝突發生。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四共和初期的一段短暫時期中，法國曾考慮試以「調解者」身分，尋求緩和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可能性。稍後，若干知識界人士又主張法國應該嚴守中立，迨法國領導階層最後選擇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時，法國祇得勉強地接受在北約組織軍事體系中追隨於英、美之後，並極不願意地同意重新武裝德國。在如此的兩極國際格局下，減少了法國在國際上任何運作的空間，這就是為什麼「征服雅爾達」、「超越雅爾達」一直是法國戰後無時或忘的努力目標，也成為戴高樂在外交上追求的重要政策，此一政策目標的達成，不僅將可擴大「中量級」國家如法國的活動空間，也可使歐洲（西歐）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有發言權的角色。^⑥

法國所持的理論是：當兩個超級強權衝突對立但又希望避免發生一場核子戰爭時，而歐洲又在分裂的情況下，法國則可有相當程度的自行運作空間。因此，一九六三年以後，法國在戴高樂主政期間，首先採行「低盪」（La Détente）的外交政策，^⑦西德亦隨之跟進，當時主張「東進政策」的西德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甚至逕與莫斯科正面接觸，有意承認

註⑤ 請參閱蘇秀法，「新德國的誕生」，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十五期，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第七頁。

註⑥ Stanley Hoffmann, "La France dans le nouvel ordre européen," *Politique Étrangère*, (Paris), No. 3, Automne 1990, p. 503.

註⑦ "Chronique d'une présidence," *Le Monde*, numéro spécial, mai 1990, p. 3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各國領土現狀的既成事實和疆界的不可侵犯。^⑧以當時法國和德國情勢分析，法國擁有各種優勢，如獨立的打擊武力（Force de Frappe）和自主的防禦政策；而同為北約會員國的德國則背負著曾為侵略者的包袱，和遭受國土分裂的不幸。此外，當時法國進一步退出了北約的軍事體系，^⑨而且全力和蘇聯修好以保持特殊的關係。所以，在法國主動外交攻勢下，「雅爾達秩序」並不是祇有負面的影響。「雅爾達秩序」的消失，使法國達到了她的外交目標之一：也就是減輕了超級強權加諸於歐洲盟友的壓力。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法國極不願見到曾經掀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重歸統一。

對德國的疑慮

法國對新歐洲中的德國的確懷著相當程度的疑慮心態，法國之所以要和蘇聯在東歐爭取一席之地之影響力，也正是這種不安心情的反映。一九八九年以前，法國和其他國家看法一樣，認為德國統一的日子仍然非常遙遠。雖然過去三十年來法國都一直宣稱支持德國統一，許多法國政界領袖也呼籲要「克服」雅爾達密約下的歐洲格局。但過去的法國安全政策實際上都植基於東、西兩個歐洲和東、西兩個德國分裂的假定上。甚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法國外長杜瑪（Roland Dumas）和當時國防部長雪佛勒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仍然堅信德國統一決不是一個「當前的」問題。

^⑩稍後事實證明這項判斷錯誤時，法國開始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延遲解決德國問題的安排，曾經提升了法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而德國統一和蘇聯撤軍的可能結果，勢將改變這個局面，法國學者拉魯舒（Pierre Laluche）預料，「一個經濟超強的德國，將在政治上支配中歐，法國將淪於次要的地位，戴高樂認為擁有核武的法國主導歐洲政治的夢想也將破滅。」^⑪

法國政論家以及政府中若干高級官員都對這演變表示深切關注。為鼓勵法國人恢復信心，驅除「恐德症」，外長杜瑪等人更提出許多理由，要法國人毋須對德國懷有不必要的「自卑感」。他們也提醒法國人注意的是德國現在已有一段實施民主政治的歷史，對北約和歐市也都曾經作過承諾保證，但仍難說服一些法國人，他們耽心法國在歐洲地位和影響力趨於式微

^⑧Hans von der Groeben, "Replique Fédérale d'Allemagne," *Combat pour l'Europe*, (Luxembourg: Office des Publications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1985), p. 36.

^⑨"La France Quite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de l'Otan," *Le Monde*, numéro spécial, mai, 1990, p. 18.

^⑩Mark Blaise, "Mitterrand's Dilemma," *European Affairs*, 4/90 Winter, p. 64.

^⑪"Cette grande Allemagne qui inquiete," *Le Point*, le 5 mars, 1990, p. 44.

，德國人的「過分自信」或「盛氣凌人」的態度，或將導致近年來一向友好的法、德關係向後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對德國感到不安的焦慮心態，已因巴黎與波昂之間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更形加深。法國對西德未先與法國及其他盟邦諮商之前所做的幾項決策，表示驚愕，如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柯爾宣佈德國統一的十點計畫，事先就沒有知會法國。¹²又如自行允許德東加入經濟和貨幣聯盟，以及宣佈德東地區的特殊軍事地位等等都是，而德東地區的特殊軍事地位是一九九〇年七月柯爾和戈巴契夫高峰會議逕行決定的。¹³

法國最關心的就是其軍事實力可能遭受「政治貶值」的危險，在世界局勢趨向緩和、武器管制、武力威脅減退、以及蘇軍即將大規模撤離東歐的情況下，法國對德國安全可能所作貢獻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而統一後的德國又具有足以維護本身國防安全的潛力，再加上其軍事自主性的提升，也勢將降低法國在新歐洲安全上原先扮演的角色。法國的核子武力及其軍事態勢所具有的意義必然日漸減少，相反地，德國的政治分量則在加重，而德國本身的國防已不再因倚重盟國整體的安全架構而抵銷她在經濟上的優勢。

法國和其他盟國曾一度耽心促使德國留在西方陣營內的努力或將功虧一簣，因為德國與蘇聯關係的發展似有日漸步上我行我素的道路，或甚至會以蘇聯軍事力量與德國的經濟實力及技術經驗的結合作為德—蘇和解的基石。法國政界領袖不論是左派或右派都難忘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德蘇條約（Rapallo）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往事，這些歷史上的先例不能不視為前車之鑒。¹⁴

法國認為，如果中歐一旦在德、蘇兩國主導之下合作起來，法國在政治上勢將立刻感到孤立，而不得不在壓力之下尋求和歐洲新的領導者合作，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國的地位是相當脆弱的，德、蘇兩國的實力都較法國優越，一旦兩國和其鄰邦國家結成一個新的聯盟關係，尤其在美國軍力從歐洲撤出情況下，可能非常危險。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六日，西德總理柯爾與戈巴契夫就有關德國統一後繼續留在北約組織直接談判，達成協議，致使稍後在莫斯科舉行的「二加四」會議流於形式，就是證明。¹⁵

當前法國的政策所追求的目的是使上述這些恐懼實現的可能性消滅。巴黎計畫竭力與新的德國培養一種彼此互信的關係，加速歐市經濟貨幣和政治聯盟的建立。雖然如此，但法國的無力感仍然存在，這種無力感和易受傷害的情緒成為法國處理

註12) Claire Trean, "La France et le Nouvel Ordre Européen," *Politique Française*, 1/91, p. 82.

註13) 同註12, 第三頁及第八頁。

註14) 同註12, 第五頁。

註15) 同註12, 第十頁。

歐洲政治，安全機構事務時，難以揮去的暗影。

法、蘇關係的暗流

法國官員們指出，縱令華沙公約已完全解散，蘇聯各共和國紛求獨立導致蘇維埃體制解體，而擁有人口一億伍千多萬，土地面積是法國領土三十倍的俄羅斯共和國仍是歐洲最大的軍事強權。即令蘇聯的軍隊削減一半，但蘇聯在歐洲依然是軍隊最多的國家。^⑯東歐的波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利亞等國家，由於地理位置緊鄰蘇聯，如要擺脫蘇聯勢力的影響圈，將不如目前許多人想像中的那麼快速。法國決策當局主張，西方國家對蘇聯仍需保持著「警戒」狀態，其他西方國家的看法也和法國相似，認為蘇聯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以及以和平方式解決各民族之間的問題固然應該予以鼓勵，但密特朗總統提出警告：一個也許不是共產黨的蘇聯新政權，並不能保證它將不會是一個軍事的專制政權。^⑰

蘇聯內部出現的動亂情況，和東歐各國的搖擺未定的局面，最後究將如何演變，尚難逆料。因此，巴黎決定法國應繼續保持其軍事力量，並將各項軍備予以現代化，反對草率而不當的削弱大西洋聯盟的功能，同時繼續加強歐洲共同體政、經整合，與其他盟國進行西歐安全密切而實際的合作。

上述政策可說是一九八〇年代法國調整其安全政策後一劑「對症下藥」的「處方」，也強調了法、蘇關係仍潛藏著一股猜疑的暗流。

然而，目前法國對東歐和蘇聯的政策理論是建立在寧作「最好希望」，而不作「最壞打算」的觀點上。北約盟邦和歐市國家都認為，蘇聯和東歐各國民主化的成功和經濟走上繁榮之路，從長遠觀察，將可加強而非威脅西方的安全。

根據這個看法，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德國總理柯爾曾共同促請西方國家對蘇聯立刻提供經濟援助。密特朗堅決表示戈巴契夫是值得支持的對手，對美國主張蘇聯「先改革再說」的立場難表贊同。^⑱不過，法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動機似乎並不完全單純，法國熱心支持蘇聯的政、經改革，主張予以援助，或許是爲了和德國競相爭取對蘇聯的特殊友誼。

註⑨ David S. Yost: "France in the New Europe," *Foreign Affairs*, Winter / 1990-91, p. 109.

註⑩ Henri Paris: "La France, Ennemi Principal de l'URSS en Europe?" *Défense Nationale*, jan. 1988, pp. 51-64.

註⑪ "Les Sept Grands Pays Industrialisés Divisés sur l'Aide à l'Union Soviétique," *Le Monde*, le 16 juillet, 1991, p. 1.

兩難的處境

由於戈巴契夫執政五年來採行開放政策，以及在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的壓力之下，蘇聯在東歐的控制力迅速消退，華沙公約組織因之解體，東、西德得在極快的速度下完成統一。但是，一九八九年秋天歐洲出現的可能新情勢，將法國推向兩難的處境之中。第一種可能是德國統一後，西德的力量延伸到東德，一個具有實力的統一新德國，可能成爲今後歐市的主宰；另一種可能是德國或將有一天斬斷與北約和歐市的關係，重新成爲歐洲的巨人，進而出現所謂的第四帝國，使歐洲又籠罩在惡夢陰影之中。^{①9}

至於蘇聯，由於內在的困境，自顧不暇，使之成爲超強的冷戰時代亦已結束，在此一情勢之下，就戰略價值而言，北約組織似乎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但是，所有的西歐人都希望能防止一個「脫韁」德國的再生，這個希望自然也強調北約繼續存在的必要性。至少從現在開始的若干年之內，北約組織的功能是用以規範德國，而不再是像過去冷戰時代專用以遏阻蘇聯了。法國根據本身的利害，極力主張統一後的德國必須留在北約組織之內，以便受到約束。目前，法國和法國以外的政界人士已建議法國應該重返北約的軍事體系。^{②0}

就實力而論，法國本身存在有不可否認的障礙。雖然法國人口的成長比西德快速，但其成長速度却遠趕不上統一後的德國。在經濟方面，法國也難望趕上統一後的德國。德國的部分資源在短期內勢將用以抵償因統一所付出的代價，但就長程目標來看，統一後的德國將成爲歐洲工商業以及金融業的巨擘，相較之下，德國的多量產品超越法國，將使其經濟影響力更爲增強，而法國又係財政赤字國家，法國固然目前在軍事上保有優勢，但今天世界多以一國經濟和金融影響力的強弱而很少再以軍事力量和土地控制的大小，來作爲衡量國力的尺度，顯然地，法國在這些方面是處於劣勢的地位。

自戴高樂離開政壇後，法國在歐洲以外的國際舞台活動空間已有相對程度的減縮，法國的「世界雄心」目前只限於法語非洲地區，偶而也及於中東的黎巴嫩，但都一無成就。戴高樂曾強調法國國防政策以發展核武爲優先，次爲傳統武力。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在總統任內也曾期待法國的傳統武力能與德國相當。^{②1}歐洲共同體中的「不平衡中的平衡」情勢從此因德國的統一而被打破。在西德總理柯爾的全力推動下，德國把統一認爲是德國人自己的事，而將一連串的既成事實明

^{①9} Stanley Hoffmann, "La France dans le Nouvel Ordre Européen," *Politique Etrangère* (Paris), No. 3, Automne 1990, p. 505.

^{②0} *Ibid.*

^{②1} *Ibid.*, p. 507.

白地擺在德國盟邦和歐洲共同體之前，巧妙地將國家統一的過程和德國應該遵守的國際規範加以分開，阻止了歐洲共同體對德國統一發展過程的控制，西德是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國，兩德統一後，東德地區也隨之享受歐市的優惠。

上述情況明朗化之後，法國政府立刻顯然有些手忙腳亂；法國總統密特朗最初宣佈德國的統一並不會使法國耽心，但到基輔（Kiev）和戈巴契夫晤談返回法國後，則又強調自從幾個世紀以來，法、蘇兩國爲了確保歐洲安全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他也對美國主張德國留在北約的政策表示贊同。若干法國非官方人士甚至建議應與英國建立新的友好關係，因爲英國對德國的統一也缺乏熱忱。這時法國外交政策一面強調四個佔領國在德國應有權利的重要性（即四加二會議），同時又尋求德國對其將來的政策應該提出保證。一九九〇年春天，德國對北約的義務和對歐市的發展都提出清晰而具體的保證，在原則上，統一的德國已作了她的選擇，而法國面對的雅爾達密約下歐洲格局消失後的新局面又將如何選擇？

「大西洋主義」抑「歐洲主義」

雅爾達密約下的歐洲格局已一去不返，歐洲新秩序又將以何一種架構建立，各有關國家根據本身利害各有打算，目前尚在相互協調和辯論階段。

美國勢將從歐洲部分撤軍以紓解其對北約的沉重負擔，但堅欲延續北約組織的存在以強化美國對歐洲事務的領導地位，美國並欲擴大北約的政治功能，使之成爲全歐政治結構的基石。²²

歐洲共同體大部分國家也強調保留北約組織的必要，但主張以直到西歐建立起本身的防衛體系爲止，並堅持北約只應具有軍事防衛功能。

英國一直保持其傳統的大西洋主義立場，支持美國。

德國主張歐洲共同體應能獨立發揮功能，同時又迎合蘇聯倡導的泛歐洲結構的某些主張。

法國則堅持歐洲主義，對革新大西洋聯盟問題遠不及對發展各歐洲組織的雙邊合作來得重視。法國既要美軍和美國核武留駐歐洲，但又不要他們駐在法國領土上；法國要統一後的德國留在北約組織之中是爲了避免中歐「戰略真空」的出現，並可藉以將德國尋求中立的可能性減到最低；法國要經由自行選擇的途徑與蘇聯建立特殊的關係，法國的政治領袖都支持西歐防衛合作的觀念，但是否準備放棄法國的特殊地位和獨立決策以及核子打擊武力則不十分明顯。至於歐洲將來的政治和安全

註② Steven Philip Kramer, "France Faces the New Europe,"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0, p. 368.

新秩序問題，法國外長杜瑪建議歐洲必須整合起來以避免霸權和戰爭的雙重危機，他主張歐市的政治聯盟運作必須包括對「歐洲安全的認同，建立歐洲新秩序的基礎應包括總統密特朗建議的『歐洲邦聯』（European Confederation）——即歐市成員國、尚未加入歐市的東歐各國及其他國家——和『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SCE），因為歐安會議包括了制衡歐洲軍力不可或缺的美國和加拿大。」²³

法國對歐洲新秩序建議如此安排，其目的似在儘可能保持法國現有安全態勢，包括行動的自主和自由；維持法國在西歐尤其在歐市的領導地位；使德國接受歐市、北約及其他西方機構的約束；縱使美國在歐洲的軍力減少，美國應信守對北約的承諾；鼓勵東歐及蘇聯繼續民主政治改革和經濟自由化的穩定推展；在保持對話和協商方式的同時，維獲權力的平衡，使莫斯科沒有被孤立的疑慮；以及防止歐市因擴大而致力量削弱或喪失其現有的分量。²⁴

可能的選擇

法國在未來歐洲政治及安全機構中究將扮演何種角色？意見分歧，尚無定論。一般認為法國當前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一是繼續以法國傳統核武嚇阻態勢為基礎的國家本位政策；另一種是經由歐洲及大西洋聯盟密切合作，重鑄歐洲政治和安全新秩序。如果法國選擇後者，特別是重視法、德合作以深化歐市的政、經整合，才是一種較有遠見的作法，這就是所謂的「歐洲主義」。「歐洲主義」目前已受到法國政見不同的黨派領袖如社會黨密特朗，戴高樂黨席拉克（Jacques Chirac）和法國民主聯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UDF）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等一致的支持。²⁵不過密特朗總統在與德國合作所採行的方式仍然顯得不够明確，處處過分考慮到與莫斯科的特殊關係，同時也太強調了法國的特殊地位，一味看重核武而忽視建立歐洲防衛實體更有效的傳統武力。

但是，法國過分堅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將會導致法國的孤立，傷害法、德關係。在長遠的目標上，過分強調「歐洲主義」的立場也會因削弱與美國的關係而使法國和歐洲安全處於不利的地位。

即令法國真正走向「歐洲主義」的道路，能否成功也是一個未知數，其前景如何，端賴法國盟國尤其是美國和德國的態度而定。如果這項政策意味著法國地位將次於德國或美國的話，勢將引發法國國內民族主義意識的反彈；又如歐市政治聯盟的超國家意識威脅到法國的主權，也會引起異議。

註²³ Yost, *op. cit.*, p. 116.

註²⁴ Yost, *op. cit.*, p. 117.

註²⁵ Hoffmann, *op. cit.*, pp. 505-506.

至於以法國傳統核武嚇阻態勢為基礎的國家本位政策，是在法國國內引起反對較小的政策選擇。法國人認為，過去多年來法國政府對核武保護國家安全的信賴並無不當，在核子嚇阻政策之下，政府可以大量削減傳統武力費用，同時，國防預算也可相對的減低，將節省下的經費用以支持社會政策，這也是社會黨的政策目標。

在目前情況下，較為可能的選擇是在「歐洲主義」與保持法國獨立自主的安全政策之間，求取一個平衡點，也就是尋出一個合理的折衷妥協。從中程甚至長程的觀點而論，一個妥協方案可將法國人對戴高樂主義的共識保留，部分保留戴高樂主義至少在政治上有其必要，因為戴高樂主義提供獨立自主的國家形象，自從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來，這種安全政策一直是法國社會凝聚力的源泉。

情形固然如此，但這一折衷途徑也可能出現三種不利的後果。

第一，核子嚇阻政策的合法性可能比過去更容易遭受挑戰，主要是因為核子反應爐的安全顧慮，核子廢料的處理問題尚未解決，綠色運動掀起的環保意識正日漸高漲。

第二，外來移民和種族歧視問題更不容忽視，特別是有增無減的北非人和其他回教國家移民在法國造成的問題，遠比德國問題或選擇歐洲安全政策問題更為棘手。外來移民對法國社會凝聚力和國內共識已構成嚴重的挑戰；國際衝突如波灣危機或北非某些地區的宗教對立都可能導致法國境內少數回教徒偏激化而釀成恐怖事件。

第三，國營軍火獨立性的喪失可能連帶影響法國國防政策。武器外銷的停滯，製造近代化武器費用的升高，以及其他各種現實因素的考慮，都可能鼓勵法國在未來武器生產和供應上尋求與盟國進一步的合作。因為坦克、戰機、船艦以及其他武器系統的陳舊過時，法國在一九九〇年代對傳統武器不得不大量予以更新。加上社會黨黨內對政府預算分配意見分歧，多主張預算應以社會福利為優先，國防預算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法國可能被迫更樂於與盟國合作。^②

如果法國政府能够克服上述的挑戰，或能走出一條妥協之路。但無疑的，法國要想繼續保持過去政策的曖昧立場，將很困難，即令戴高樂留下的策略路線在法國政策上的實質作用將會逐漸減少，但法國政府未來不管由那一個黨派執政，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儘可能將之延續下去，基於過去運用的「得心應手」，法國極不願放棄其基本安全的自主立場，因為這個安全政策曾經給予法國相當大的自主權和特殊的國際地位。

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廿一日完稿

註② Yost, *op. cit.*, pp. 127~128.